



FADS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FADS, Vol. 1, No. 1, 2026, pp.105-119.

Print ISSN: 3107-1805; Online ISSN: 3107-181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ad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ADS.26.01.08cafma>



奇诺瓦·阿契贝（Chinua Achebe, 1930–2013）

——站在十字路口的现代非洲文学之父

姚 峰（Yao Feng），汪明月（Wang Mingyue）

摘要：本文以奇诺瓦·阿契贝的生平实践与文学创作为核心，系统考察其在非洲现代英语文学谱系中的奠基性地位及其思想内涵。文章首先结合阿契贝成长背景与殖民教育经历，阐释伊博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双重语境如何塑造其文化主体意识，并成为持续的创作动力。其次，通过对《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荒原蚁丘》等代表作的分析，论证阿契贝通过对英语的挪用与重构以及对口头传统的书写化转化，建构非洲主体叙事，呈现殖民语境下的文化断裂与身份危机。进而，本文将阿契贝置于后殖民理论视域之中，结合其学术史展开反思性考察，重点讨论“混杂性”与“逆写帝国”等核心范畴。最后，从文学创作、出版实践与语言观等层面总结其思想路径，指出阿契贝在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张力中，提出一种超越文化本质主义与单一西化逻辑的非洲文化重构方案，对世界文学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阿契贝；非洲英语文学；后殖民批评；文化混杂

作者介绍：姚峰（通讯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非洲文学与思想史、全球南方文学。联系方式：yaofeng1975@shnu.edu.cn。汪明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非洲文学与思想史、全球南方文学。电子邮箱：1000546282@smail.shnu.edu.cn。

Title: Chinua Achebe (1930–2013) —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Chinua Achebe's life practice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as its central focus, offering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his foundational position and intellectual significance within the genealogy of modern African Anglophone literature. It begins by situating Achebe within his formative background and colonial educational experience, elucidating how the dual context of Igbo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shaped his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served as a sustained source of creative impetus. It then analyzes major works—*Things Fall Apart*, *No Longer at Ease*, *Arrow of God*, *A Man of the People*, and *Anthills of the Savannah*—to argue that Achebe constructs an African-centered narrative through the appropr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the textualization of oral traditions, thereby articulating cultural rupture and identity crisis under colonial condition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places Acheb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a reflective review of his scholarly reception, foregrounds key concepts such as hybridity and “the empire writes back.” Finally, by synthesizing his literary practice, publishing activities, and language ideology, it demonstrates that Achebe advances a model of Africa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that moves beyond both cultural essentialism and a unilinear logic of Westernization, exert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figur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Keywords: Achebe; African Anglophone literature; postcolonial criticism; cultural hybridity

Authors Biographies: Yao Feng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African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Global South Literature. E-mail: yaofeng1975@shnu.edu.cn. Wang Mingyue,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African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Global South Literature. E-mail: 1000546282@smail.shnu.edu.cn.

一、引言：阿契贝生平实践及其对非洲现代英语文学的贡献

奇诺瓦·阿契贝是尼日利亚现代文学核心人物，兼具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其学术与创作对非洲英语文学具有里程碑意义。阿契贝于1930年12月16日出生于尼日利亚东南部城市奥尼查（Onitsha）近郊的奥吉迪（Ogidi），父母均为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神职人员，这使他自幼浸润于伊博族传统文化与基督教西方文明的双重语境，成为其后续创作与学术认知的重要根基。伊博族素有口述叙事传统，阿契贝幼年时期，常聆听母亲与姐姐讲述民间故事，同时对村落举办的假面舞会等传统活动颇感兴趣，此类生活经验在其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艺术化再现。此外，父亲所藏书籍——如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的简写本和《天路历程》的伊博语译本——亦在早期塑造了其文学感知。值得注意的是，阿契贝早年所形成的对文化多元性（multiculturalism）的包容意识，使其日后在思想上得以与极端思潮保持距离，他在晚年回顾时明确指出，这种包容态度使其能够“稳定而全面地”看到人生的全部的前提条件。

1936年,阿契贝考入圣菲利普斯中央学校(St Philips' Central School),凭借优异的学业表现很快获得老师青睐,被评为班里书法和阅读能力最好的学生。1944年,阿契贝升入位于乌穆阿希亚(Umuahia)的政府公学(Government College),该校由殖民政府于1929年出资创办,严格遵循英国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旨在培养尼日利亚未来的社会精英。该校以英语为通用教学语言,阿契贝在后续回忆中曾提及,学校要求学生“放弃自己不同的母语,并以殖民者的语言交谈”(Achebe, 2012, p. 14)。正是在学校图书馆,阿契贝开始了系统的知识探索,他偶然接触到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自传《超越奴役》(*Up From Slavery*, 1901),并坦言“该书所记载的悲惨叙事,让我看到了现实的另一面”(Achebe, 2000, p. 50)。此外,他还广泛阅读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包括《格列佛游记》《大卫·科波菲尔》和《金银岛》,同时也阅读大量描绘西方人在殖民地“英雄事迹”的文本,如H. 里德·哈格德(H. Rider Haggard)的《冒险奇兵》(*Allan Quatermain*, 1887)、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 1910)。阿契贝后来回忆说,作为一名读者,他曾“站在对抗土著人的白人角色一边”(Achebe, 2000, p. 51),甚至对黑人心生怨恨,认为“白人善良、公道、聪慧且勇敢,而土著人则凶恶、愚蠢、狡猾。我对他们厌恶透顶”(Achebe, 2000, pp. 51-52)。这种早期的认知偏差,也成为其后续反思殖民文化、重构非洲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契机。1948年,尼日利亚独立前夕,国内第一所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现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 of Ibadan),当时为伦敦大学的伙伴学校)正式创办。阿契贝在入学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医学专业奖学金,进入该校深造。一年后,他放弃医学专业,转而主修英语、历史与神学。该校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英国教师,日后培养出诸多知名作家,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1953年,阿契贝完成伊巴丹的学业。毕业后,阿契贝进入光明使者学校(Merchants of Light School)教授英文,该校设施简陋、环境破败,坐落于当地人口中的“糟糕的树丛”(bad bush)——一片被认为受恶鬼侵扰的土地,后成为其《瓦解》(*Things Fall Apart*, 1958)中“凶森林”(evil forest)的原型。1954年,阿契贝前往首都拉格斯,在尼日利亚广播电台任职12年,初期负责谈话节目部(Talks Department)的脚本撰写,这段经历使他深入掌握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差异,其文学作品中大量鲜活、贴合生活的人物对话,大多得益于此时期的实践积累。当时的拉格斯吸引了大量乡村移民涌入,阿契贝在工作中广泛深入城市的社会政治生活,其小说《动荡》(*No Longer at Ease*, 1960)中的诸多情节便取材于这段经历。1956年,阿契贝经选拔前往伦敦,参加由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的培训项目。在伦敦期间,他结识了为其授课的小说家吉尔伯特·菲尔普斯(Gilbert Phelps),并将自己的小说手稿交由其审阅。返回尼日利亚后,阿契贝开始修改长篇小说《瓦解》。1958年6月17日,英国海因曼出版社(Heinemann)正式发售《瓦解》精装本,首印量为2000册。1960年,阿契贝的第二部小说《动荡》出版问世。1962年,他出席了在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学院(Makerere University College)召开的非洲英语作家执行会议,期间结识了非洲及全世界的重要作家,包括加纳诗人科菲·阿武诺(Kofi Awoonor)、尼日利亚剧作家兼诗人索因卡、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等。此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为“非洲文学”的界定,即该概念是否应包含海外非裔文学,或仅局限于居住在非洲作者创作的文学。阿契贝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文章,将此次会议誉为非洲文学的里程碑。会议期间,当时就读于该校的学生恩古吉·瓦·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登门拜访阿契贝,并提交了自己的小说手稿——

—《孩子，你别哭》（*Weep Not, Child*, 1964）。在阿契贝的推介下，该书于1964年由海因曼出版正式出版，恩古吉·瓦提昂戈也由此步入文学界。

阿契贝不仅是杰出的知识分子，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参与者。在尼日利亚内战（1967–70）期间，他坚定支持比夫拉地区（Biafra）脱离尼日利亚联邦实现独立。长期以来，阿契贝始终以尼日利亚动荡政局的观察者与批评家自居，他明确指出，尼日利亚军人独裁者频繁发动的政变与反政变，严重动摇了国家的民主基础。1983年，阿契贝曾短期担任尼日利亚左翼进步政党——人民救赎党（People's Redemption Party）的代理主席，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事务，践行其社会责任感。阿契贝对于尼日利亚乃至整个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作为“非洲作家系列”（African Writers Series）的资深顾问，他始终致力于发掘和提携非洲本土青年作家，帮助大批默默无闻的非洲作家实现出版作品。1971年，他在美国创办了《奥凯克：一份非洲新文学杂志》（*Okike: An African Journal of New Writing*），为年轻一代非洲作家提供了一个展示创作成果、交流学术思想的重要论坛；1984年，他又创办了双语刊物《乌瓦 尼迪 伊博：一份伊博族生活和文化的刊物》（*Uwani Ibo: A Journal of Igbo Life and Culture*），该刊物为伊博族文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作为文学创作者，阿契贝凭借其卓越的创作成就获得了众多国际国内奖项，主要包括：约克坎贝尔文学奖（Jock Campbell Award for Literature, 1964）、联邦诗歌奖（the Commonwealth Poetry Prize, 1972）、尼日利亚国家功勋奖（Nigerian National Merit Award, 1979）、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2007）。

二、阿契贝的文学创作及思想内涵

阿契贝以英语为创作语言，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聚焦伊博族传统、基督教影响及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文化碰撞，伊博族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是其创作重要源泉。值得强调的是，阿契贝对英语的使用并非被动承袭，而是通过“挪用与改写”的策略，将非洲本土语言的口头性特征、谚语文化融入英语创作，形成区别于殖民宗主国英语的独特变体，既保留英语作为国际交流工具的价值，又使其能够承载非洲经验，打破殖民话语对语言的垄断。伊巴丹大学就读期间，他创作《在乡村教堂里》（*In a Village Church*, 1953）、《新旧秩序的冲突》（*The Old Order in Conflict with the New*, 1972）、《死者之路》（*Dead Men's Path*, 1953）等短篇小说，聚焦传统与现实的矛盾融合，形成融合本土与西方元素的创作风格。其代表作尼日利亚四部曲（《瓦解》《神箭》《动荡》《人民公仆》）聚焦伊博族人独立前后的生存状态，系统反映并前瞻性预测尼日利亚社会变迁，被誉为尼日利亚文学史诗；1987年发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荒原蚁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1987）则标志其对后殖民政治与知识分子处境的进一步反思。此外，他还著有短篇、诗歌、散文、评论及儿童作品，构建了完整的文学创作体系。整体而言，阿契贝的创作既拒绝文化本质主义的复古倾向，也反对全盘否定本土传统的虚无立场，而是在殖民与本土文化的“罅隙”中，探索混杂与重构的可能性。

《瓦解》（1958）是阿契贝首部长篇小说，全球销量逾千万册、被译50余种语言，以伊博族勇士奥孔库沃（Okonkwo）及其部族命运为核心，再现英国殖民入侵前后伊博族社会结构与文化秩序的变迁。其创作动因部分源于对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的《约翰逊先生》（*Mr. Johnson*, 1939）及康拉德《黑暗的心》中殖民话语下非洲负面形象的批判。阿契贝曾在相关评论中指出，《黑暗的

心》通过“非人化”的再现方式建构了种族主义想象，其自身创作则旨在重构非洲文化主体叙事，打破西方“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非洲想象。小说以三阶段结构展开：殖民前乌默邦（Umuofia）村落的传统图景、奥孔库沃放逐期间殖民者对本土社会的侵蚀、主人公悲剧结局与旧秩序的崩塌。作品通过婚姻伦理（爱克蔚菲与奥孔库沃的情感联结）、政治形态（部族长老集体磋商的传统民主）的描写，实现对欧洲中心主义非洲形象的“逆写”；从非洲流散文学视角看，奥孔库沃放逐归来沦为“故土的异乡人”，最终自缢于象征祖先联结的大树下，以悲剧祭奠传统文明的消亡。这种悲剧并非单纯的传统消亡，而是殖民冲击下本土文化身份断裂的具象化，呼应了阿契贝对“无尽的分裂的主体”的批判。

《动荡》（1960）延续家族叙事，以奥孔库沃之孙奥比·奥孔库沃（Obi Okonkwo）为中心，书写受西式教育的非洲青年在殖民晚期社会中的伦理困境。小说以倒叙手法，讲述《瓦解》主人公之孙的悲剧：乌默邦进步联合会资助其赴英求学，归国后任职于奖学金委员会，最终因情感挫折、财务危机陷入腐败，锒铛入狱。小说通过奥比在文化夹缝中的价值失衡与人格异化，反映尼日利亚独立前夕青年一代的生存困境——他们既无法完全融入西方文化，又与本土传统产生隔阂，成为文化流散中的“精神无家可归者”。作品探索超越“西化派”与“传统派”二元对立的民族发展路径，属典型的“返乡叙事”，其深层内涵契合阿契贝后殖民思想中“文化混杂”的主张，即拒绝非此即彼的选择，试图在本土与西方的碰撞中寻找平衡，凸显流散者的精神归宿困境。

《神箭》（*Arrow of God*, 1964）与《瓦解》《动荡》并称非洲三部曲（The African Trilogy），通过祭司埃泽乌鲁（Ezeulu）的命运，揭示传统宗教权威在殖民行政与基督教扩张中的瓦解。小说以“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为制度框架，呈现政治权力、宗教权威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互动，其叙事核心并非个体的命运悲剧，而是本土整体信仰体系的崩塌与民众精神世界的失序。小说核心人物埃泽乌鲁——乌姆阿若（Umuaro）六个村子的优鲁神大祭司。埃泽乌鲁作为部落精神领袖，兼具神与人的双重属性，面对白人到来引发的土地纠纷、神权权威下降、父权体系瓦解等危机，他拒绝充当殖民傀儡，又试图通过“献祭”式的抵抗重构部族凝聚力：他同意在自家附近修建白人教堂，送儿子加入白人宗教，实则为了“看清敌人”，将儿子作为部族“制药”的祭品，以神学视角应对现代政治危机。最终，埃泽乌鲁拒绝宣布新木薯节的到来，导致庄稼腐烂、饥谨爆发，村民转而皈依基督教，传统信仰体系彻底瓦解，他自身也陷入众叛亲离、精神崩溃的境地。小说将归宿问题提升至宇宙论高度，既凸显文明失去神圣内核后的精神流散，也展现了非洲知识分子在殖民冲击下“回心与抵抗”的复杂心理——既反抗殖民压迫，也批判本土部族的内耗与麻木，其悲剧是非洲传统文明在殖民浪潮中毁灭的缩影，也呼应了阿契贝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 1966）以第一人称叙述，嘲讽后殖民时期政客的腐败堕落：文化部长南噶（Nanga）自诩“人民公仆”，实则敛财擅权，叙述者奥迪利（Odili）因情感纠葛与之对抗，故事以军事政变收尾，预言了尼日利亚后续政局动荡，将“归宿”问题置于后殖民政治废墟中，揭示独立后“家园”沦为权力赌场的现实。该部作品进一步延续了阿契贝的后殖民批判，直指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的“灵魂危机”——国家独立后并未实现真正的文化与政治解放，反而陷入权力腐败与精神空虚，呼应了阿契贝对“殖民遗产”的深刻反思。

《荒原蚁丘》(1987)曾获布克奖提名,讲述三位留英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卡根国(Kangan)的治理困境,批判全盘西化的统治模式,塑造了具有反抗意识的新女性比阿特丽斯(Beatrice Okoh)形象。作为阿契贝“返乡”母题的总结,该书将非洲流散者的最终归宿寄托于未来的文化重建,这一主张与阿契贝的后殖民思想高度一致——拒绝本质主义的文化复古与全盘西化,主张在本土传统与西方元素的“混杂”中,构建新的非洲文化身份与精神栖息地。

阿契贝的文学评论与杂文贯穿一生,收录于《创世日前的黎明》(*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Essays*, 1975)、《尼日利亚的不幸》(*The Trouble with Nigeria*, 1984)等文集中,涵盖殖民叙事、本土文化、后殖民政治等议题,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核心线索是其精神栖息地的重建,构成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契贝评论的核心立场是拒绝“普遍主义”(实则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学解读标准,主张以非洲视角解读非洲文学;同时,他与恩古吉等非洲作家就“创作语言”展开争论,反对恩古吉“放弃英语、回归本土语言”的激进主张,坚持通过改写英语实现对殖民话语的消解,彰显了其“文化混杂”的后殖民思想。

三、后殖民语境中的阿契贝及其学术史反思

如果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的出版标志着“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范式的诞生,那么早在20世纪初期,类似的文学、文化和政治批评活动就已在殖民地蓬勃兴起。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奇努瓦·阿契贝与艾梅·塞泽尔(Aime Cesaire)便是三位具有非洲文化背景的早期后殖民思想家和批评家。可以说,赛义德虽是后殖民理论的集大成者,却并非开创者,他本人的理论建树也无疑受到了早期后殖民思想家的影响。

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家,聚焦西方知识体系与话语建构背后的权力关系,对西方现代性展开殖民历史视角的整体反思。但此类出身前殖民地、后又进入西方学术机构的理论家们究竟能否挣脱西方学术的价值网络,真正从第三世界或前殖民地的角度展开各自的学术活动,这一点广受质疑和诟病。赛义德本人也坦言其“研究东方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考察东方学与东方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为了考察东方学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它对东方的看法……不管其与‘真正’的东方之间有无对应关系”(Said, 1978, p. 12)。显而易见,赛义德否认自己的研究能够代替对于“东方”本身的研究,而实际上其后殖民理论和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西方思想和学术本身,理论本身也深受西方哲学思潮的规定和限制。于是,每当某些第三世界民族和地区将赛义德视作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代言人,他总是感到不以为然,甚至为自己遭到了“误读”而颇为反感。

如果说赛义德对于文学作品在内的西方经典的重新解读颠覆性地开启了研究传统英美文学的“东方主义”视角,那么,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等于1989年出版的《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 1989)则是根据前殖民地文学研究后殖民理论的开山之作,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赛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研究领域。国内有学者指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仅仅梳理了西方殖民宗主国的东方主义话语,并没有涉及东方自身,《逆写帝国》一书则恰恰论述了殖民主义阴影下的殖民地文学”(任一鸣, 2008, p. 103)。阿什克罗夫特等指出,对于后殖民写作的复杂性和不同的文化起源,欧洲的理论似乎无力应对,这也就是其“后殖民文学理论”思想产生的原因(Ashcroft et al, 1989, p. 11)。在此,“后殖民文学理论”试图对前殖民地不同于欧美传统的文学

实践做出理论回应。《逆写帝国》不仅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后殖民文学文本，同时关注产生于本土的理论和批评。在“处于十字路口的理论：本土理论和后殖民阅读”一章中，非洲文学理论颇为引人注目。在论及非洲本土英语文学时，阿什克罗夫特等指出了非洲作家和评论家独特的文学艺术观念，即注重文学的功能、作家的角色和传统的文学形式。坚持作家的社会角色，反对欧洲文学关注作家个人经验的传统，这似乎是非洲文学创作的独特美学。在此，阿什克罗夫特等专门引用了阿契贝《作为教师的小说家》（*The Novelist as Teacher*, 1965）一文中所谓“最具权威的章句”（locus classicus）：

作家不能指望逃避必须履行的再教育和再生的任务。事实上，他应该行进于最前方……我本人无意逃避责任。如果我的小说（尤其那些以过去为场景的小说）能够告诉我的读者，他们的过去——尽管不尽如人意——并非是野蛮的漫漫长夜，他们并非被第一批代表上帝到此的欧洲人从中拯救出来。也许我的写作是实用的艺术，而非纯粹的艺术。但这又如何呢？艺术是重要的，而我关心的这类教育同样重要。（Achebe, 1965, p. 45）

阿什克罗夫特等指出，阿契贝对于非洲文学的社会政治属性的强调是其作品和评论一以贯之的风格（Ashcroft et al, 1989, p. 119）。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风格又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同时代以及以后的非洲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活动。下文试图梳理阿契贝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早期研究以《瓦解》出版后的书评为起点，聚焦小说对非洲文化的真实性呈现。1958 年默西迪丝·麦凯（Mercedes Mackay）在一份由英国“王权非洲协会”（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主办的刊物《非洲事务》（*African Affairs*, 1958）中盛赞阿契贝，认为其呈现了殖民前“一幅轮廓清晰、入木三分、绝对真实的非洲乡村生活画面”（Mackay, 1958, p. 62）。本·奥布姆赛鲁（Ben Obumselu）虽肯定其真实性，却指责其未能捕捉非洲村庄的精神诗意，同时也承认《瓦解》是第一部从内部呈现西非民族生活与社会制度的英文小说（Obumselu, 1967, pp. 217-218）。杰拉尔德·摩尔（Gerald Moore）将阿契贝的怀旧现实主义与几内亚法语作家卡马拉·莱（Camara Laye）的怀旧理想主义相区分，认为阿契贝以客观务实的态度重现了非洲传统生活，其作品具有人类学价值（Moore, 1962, pp. 34-35）。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侧重作品的宗教学、人类学与档案学价值。

欧洲学者打着人类学的招牌从事阿契贝研究，似乎给自己披上了科学和真理的外衣，殊不知欧洲的人类学深受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影响，所谓阿契贝研究的人类学途径同样充斥着偏见和歧视，也为日后的后殖民文学批评家西蒙·吉坎迪（Simon Gikandi）等树立了攻击的靶子。奥斯汀·谢尔顿（Austin J. Shelton）以通晓非洲文化的人类学家自居，自恃比阿契贝更谙熟伊博族文化，对于阿契贝通过作品将非洲社会的瓦解归咎于白人的侵入不以为然。谢尔顿认为一切都源于“奥孔库沃的罪恶行径”激怒了众神，并“祸及子孙”（Shelton, 1970, p. 88）。对此，加拿大作家和评论家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则反驳认为，伊博社会的解体既有“内部的问题”，也有“外部的入侵”（Laurence, 1968, p. 110）。所谓人类学的文学批评，就是将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在评论尼日利亚文学的《长鼓与大炮》（*Long Drums and Cannons*, 1968）一书中，玛格丽

特·劳伦斯指出,阿契贝在《瓦解》中讨论了“伊博人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瓦解的原因以及社会变迁影响个人生活的方式”(Laurence, 1968, p. 111)。劳伦斯将阿契贝小说视为研究伊博社会历史的对象,通过与人类学资料比对,分析欧洲入侵对伊博社会的冲击(Laurence, 1968, pp. 111-113),其研究路径与摩尔有相似之处,但资料来源更为多元。

普世主义批评(universalist criticism)是阿契贝研究的另一派批评路径,却遭到阿契贝本人严厉批判。约翰·波维(John Povey)受利维斯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主张以研究西方文学的标准解读非洲文学,认为阿契贝作品符合英语文学“伟大传统”,可与哈代、康拉德等西方作家并列(Povey, 1970, pp. 112-115)。查尔斯·拉森(Charles Larson)则以西方小说为标尺,否定阿契贝作品价值,认为其借用非洲口头传统、强调群体而非个性,属于“情景小说”(Larson, 1976, pp. 86-87)。阿契贝揭穿普世主义的本质是欧洲地方主义,指出西方作家作品被默认具有普适性,而第三世界作家却需刻意迎合(Achebe, 1975, p. 8)。本·奥布姆赛鲁(Ben Obumsele)也批评阿契贝未能创造性转化欧洲小说形式,缺乏非洲本土风格(Obumsele, 1967, p. 222)。因此,非洲文学的普世主义论调反而激发了非洲本土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后殖民特征。

随着研究深入,阿契贝研究逐渐转向系统专著,实现了从外部价值向文学价值的转向。英国学者杰拉尔德·摩尔(Martin Banham)所著《七位非洲作家》(*Seven African Writers*, 1962)将阿契贝视为怀旧现实主义作家,肯定其对传统世界的艺术再现,但误将阿契贝的传媒工作视为对文学创作无益的行政事务(Moore, 1962, p. 32)。戈登·道格拉斯·基拉姆(G. D. Killam)所著《奇努瓦·阿契贝的小说》(*The Novels of Chinua Achebe*, 1969)具有开创性意义,首次聚焦作品文学价值,归纳出阿契贝及同时代作家关注的三大命题:殖民主义遗产、英语的使用、作家的社会职责,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范式(Killam, 1969, p. 1)。大卫·卡罗尔(David Carroll)所著《奇努瓦·阿契贝》(*Chinua Achebe*, 1980)分析了阿契贝各部作品的人物、叙事与文化内涵,强调其调动英语表述非洲经验的天赋(Carroll, 1980, pp. 134-140)。罗伯特·雷恩(Robert M. Wren)所著《阿契贝的世界》(*Achebe's World*, 1980)则结合多学科背景与档案文献,建立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的关联,为深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Wren, 1980, p. vii)。

上述有关阿契贝研究的文献虽然并未凸显明确的“后殖民”性,但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后来所谓阿契贝“后殖民”研究的主要议题:如对欧-非文学的逆写、非洲文学的语言问题、非洲作家的社会政治属性等等。俄比·瓦里(Obi Wali)较早从民族身份认同的角度对非洲英语文学(包括阿契贝的作品)给予否定的评价,否定阿契贝作品的非洲文学属性,认为其以英语创作、借鉴欧洲叙事策略,背离了非洲意识(African sensibility)(Wali, 1963, pp. 17-18)。与瓦里持相同观点的另一位作家和评论家便是恩古吉·瓦·提昂戈,他同样激烈地反对将阿契贝等非洲作家以欧洲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归入非洲文学之列。与之相对,另一类语言批评聚焦微观层面,上世纪60、70年代起,批评界开始关注阿契贝小说的口头特征。著名阿契贝研究专家伯恩思·林德福什(Bernth Lindfors)提出,阿契贝发展了“非洲本土语言风格”,其小说中大量谚语和明喻既营造了本土文化语境,又实现了文化本真性,还成为推进叙事、深化主题的文体手段(Lindfors, 2009, pp. 76-78),这与查尔斯·拉森否定口头传统价值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后殖民视角下的阿契贝研究,核心聚焦于“混杂性”与“逆写”两大议题。阿卜杜尔·简穆罕默德(JanMohamed)较早从后殖民角度分析阿契贝作品,认

为阿契贝通过富有口头性的语言和叙事模式张扬了非洲前殖民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试图颠覆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书面或书写的（chirographic）表征结构的霸权。默罕默德将阿契贝作品受欧洲小说启发而达成的文本效果（textual effect）与毕加索油画从西非艺术中获得灵感而产生的奇特质感做了类比，由此提出了后殖民批评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后殖民文化的混杂性或者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混杂特征。霍米·巴巴后来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中提出了“hybridity”这个术语。正如简默罕默德所作的精辟分析，《瓦解》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作为“书面口头叙事”（written oral narrative）将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巧妙地加以融合，从而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关系。对于阿契贝研究中极具后殖民性的“混杂性”概念，比奥东·杰义弗（Biodun Jeyifo）也许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混杂性表现为“文化肯定”（cultural affirmation）与“文化批判”（cultural critique）之间的辩证关系，即阿契贝的小说中既有对伊博族文化的赞美的一极，又有“文化去神秘化”或嘲讽与反思的另一极（Jeyifo, 1991, p. 256）。故而，阿契贝小说中的批判锋芒既指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时也针对传统非洲社会的种种弊端。西蒙·吉坎迪则从作为抵抗策略的后殖民文化政治这个更高的层面上解读阿契贝小说的混杂性或矛盾性：白人地方官通过书写将乌默邦的历史压缩成殖民史文本；阿契贝也通过书写把他的人民从此文本中解放出来，并将伊博文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镌刻在试图压制它们的语言和形式之上；虽然地方官的话语终结了小说的文本，然而书写地方官话语的却是阿契贝这个挪用了西方叙事传统的非洲作家（Gikandi, 1991, p. 150）。

阿契贝后殖民研究的另一重要命题是对西方叙事和话语的“逆写”和抵抗。西蒙·吉坎迪指出，阿契贝的核心目的是与殖民主义话语缠斗，颠覆西方对非洲的刻板想象、开创抵抗话语，脱离殖民叙事语境便无法理解其文本的革命性（Gikandi, 1991, p. 152），这一“逆写”路径在《逆写帝国》中得到理论阐释。英尼斯（C. L. Innes）追溯阿契贝创作动机，指出其创作始于对乔伊斯·卡里《约翰逊先生》殖民叙事的回应，《瓦解》《动荡》均以伊博视角回击欧洲殖民文本，重建非洲叙事（Innes, 1990, pp. 1-5）。大卫·卡罗尔也指出，阿契贝作品与欧洲人“黑色非洲大陆”的刻板想象形成鲜明反差（Carroll, 1980, p. 22）。英尼斯1990年所著《奇努瓦·阿契贝》，超越前人导读式研究，结合历史文化语境与作家际遇，聚焦阿契贝对欧洲殖民叙事的逆写，堪称第一部从殖民批评视角阿契贝研究的力作。

国内阿契贝研究起步较晚，长期处于零散化、初级阶段，多引介国外研究成果。瞿世镜、张湘东的文章较早向国内介绍阿契贝生平和作品，此后研究多聚焦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以后殖民理论为主要研究方法（瞿世镜，1997；张湘东，1999）。赵稀方将阿契贝定位为后殖民先驱，肯定其早于赛义德批判《黑暗的心》、开启后殖民批评路径的贡献（赵稀方，2000）；任一鸣则重点关注阿契贝对英语的非洲化改造（任一鸣，2008）。国内有关阿契贝研究的其它主要成果包括：《文化的冲突与传统民俗文化的挽歌——从民俗学视角解读奇诺瓦·阿切比的小说〈崩溃〉》（黄永林、桑俊，2006）；《帝国反写的典范——阿契贝笔下的白人》（颜志强，2007）；《欧洲中心主义社会文化进步观的反话语——评阿切比〈崩溃〉中的文化相对主义》（陈榕，2008）；《荒诞与反抗：阿契贝小说〈天下太平〉的另一种解读》（杜志卿，2010）；《阿契贝的后殖民思想与非洲文学身份的重构》（姚峰，2011）；《阿契贝的〈瓦解〉与小民族文学的游牧政治》（姚峰，2013）；《家乡土地上的流浪者：〈瓦解〉中奥贡喀沃的悲剧》（朱峰，2013）；《阿契贝与非洲文学中的

语言论争》（姚峰，2014）；《阿契贝与小民族语言的解域实践》（姚峰，2015）；《现代非洲知识分子“回心与抵抗”的心灵史——对钦努阿·阿契贝小说〈神箭〉的分析》（蒋晖，2015）；《钦努阿·阿契贝长篇小说中的口述性论析》（段静，2017）。不可否认，国内阿契贝研究乃至整个非洲文学研究长期处于暗处或盲区，研究方法多追随西方学界，缺乏中国学者自身的观察视角与立场。后殖民理论作为主流研究方法，虽需借鉴赛义德、巴巴、斯皮瓦克等学者的思想，但这些理论家的视野局限于西方文本中的非西方世界，导致运用其理论分析第三世界文学时易出现“削足适履”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世界文学兴起与中非文化交流升温，阿契贝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学界已开始反思后殖民理论的局限，尝试另辟蹊径、重新审视非洲文学价值。

四、阿契贝的文学遗产

享有“现代非洲文学之父”美誉的阿契贝，为非洲乃至世界文学与思想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方视角下的非洲叙事长期充斥着污蔑与误读，为还原真实的非洲面貌，阿契贝毕生以文学创作作为为非洲正名的核心路径。其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为尼日利亚重构了民族身份和历史叙事，更将殖民主义历史遗产与非洲文化传统加以融合，为非洲发声，构建了后殖民时代非洲话语的范式。值得注意的是，阿契贝并非理论家，未曾建构系统的学说，其相关思想散见甚至“隐匿”于文学作品、批评文章与访谈之中。鉴于阿契贝在非洲本土环境中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并长期在当地从事创作、传媒与教学，其后殖民文学创作和话语批评更能立足殖民地本体视角，形成有别于西方学院派的后殖民思想。下文结合其文学作品、批评及评论，从文学创作、出版实践、语言观等角度归纳其非洲文学思想。

阿契贝的父亲早年皈依基督教，并为尼日利亚“传教协会”工作长达35年。教会家庭背景使阿契贝自幼受到基督教和伊博传统的双重熏陶。两种异质文化——基督教表征的殖民者文化与本土传统宗教表征的被殖民者文化——相互交融，并体现在他所接受的教育上。他小学就读于“传教协会”创办的学校，后续在政府兴办的英式中学和大学接受教育，这一经历使其得以同时接触英国学校的必读书目与非洲本土相关典籍。阿契贝的成长环境兼具传统非洲、殖民和后殖民三重特征。虽置身于异质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中，但作为本土伊博族人，他对本民族语言与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同时对西方“东方主义”话语篡改和歪曲本民族历史与身份有着本能的反感与抗拒。他早年阅读的小说多呈现“白人善良、野蛮人邪恶”的刻板叙事，当他逐渐认清此类叙事背后的殖民主义本质后，便决心重构非洲叙事：“新的故事必须写出来，那些有关白人和野蛮人的故事实在不是我自己的故事”（Achebe, 2000, p. 52）。阿契贝此后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与文化政治批评，本质上均可视为对帝国主义殖民话语的逆写和批判。其在大学期间创作《瓦解》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写作与批评标准：通过小说重新书写民族的身份和历史，“未必要对抗别的民族，而是要拯救自己，因为有关自己民族的另一种叙述还未能被表达出来。因此，我需要做的就是将其表述出来，与其他叙述并置，并进行互动”（Achebe, 2000, p. 43）。此处所言的“另一种叙述”，正是彰显非洲认同、颠覆西方叙事的文学表达。阿契贝一生创作五部小说，以尼日利亚人视角讲述本土故事，书写人心动荡、善恶美丑，呈现非洲社会真实的百态人生。正是挪用小说这种外来的、异质的叙事手段介入非洲语境并与之“杂糅”，阿契贝建构了当代非洲的后殖民文学话语。

阿契贝的文学思想始终贯穿着深刻的“返乡”情结，这个“家乡”就是“部落”，即前殖民时期的伊博传统——一个未被西方话语污染的精神故乡。他的所有创作本质上都是一次次“精神返乡”的尝试：通过书写，他试图重建被殖民叙事拆解的家园。然而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完全的“返乡”已无可能，因为殖民历史不可逆转地改变了非洲。因此，他的作品始终在“怀念”与“批判”之间保持张力：既深情地描绘传统，又无情地揭露其内部的压迫（如对孪生子的遗弃、对“osu”种姓的歧视）。这种张力正是流散者特有的“双重意识”——既不属于过去，也无法安于现在。阿契贝最终给出的归宿方案，不是退回传统，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杂糅”中创造一种新的非洲文化主体性。

阿契贝一生与媒体、出版机构保持密切互动，此类经历成为其文学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通过与西方出版机构协作，积极推动本土出版事业，促成西方与非洲出版机构、作家、评论家之间的跨文化联盟，旨在对抗殖民时期及独立后仍盛行的殖民主义思想与文学批评对非洲文学的话语歧视与霸权。学生时代，阿契贝曾担任《乌穆阿希亚政府学院杂志》的编辑，后任伊巴丹学生会会刊《大学先驱报》的编辑。这些早期经历培养了他捕捉新思潮的能力。1961年，海因曼教育图书出版公司决定推出“非洲作家系列”，次年12月，阿契贝受邀担任该系列的编委会顾问。他通过这一系列不遗余力地鼓励并推出年轻作家，以自己作品的高销量和利润间接支持其他非洲作家的出版。海因曼的“非洲作家系列”将非洲英语文学推介至全世界，改变了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谱系中长期缺位和失语的不利局面，同时以非洲文学的独特样式挑战了西方文学经典范式。尼日利亚内战爆发后，阿契贝为躲避种族屠杀而逃离拉各斯，回到东部地区，并与诗人克里斯托弗·奥基博创立“城堡出版社”（Citadel Press），主要出版非洲儿童文学，以鼓励本民族口头文学的探索与创作。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及出版活动颇具革命性，旨在培养未来非洲社会的公民以实现政治变革，充分体现了对西方出版机构的批判性反思及其出版物意识形态偏见的揭露。1971至1972年，阿契贝在尼日利亚大学任教期间主编了激进校园刊物《恩苏卡领域》，表达对学校行政部门的不满。1971年，他创办《奥基凯》，以加强对非洲文学的讨论。他声明创办这份刊物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境遇能被倾听，说明这种文化有能够贡献给世界的东西。虽然存在着其他文化形态、其他态度和其他观察世界的方法，但我们所拥有的是自己的文化，并有义务呈现其价值”（Achebe, 2000, p. 68）。他强调：“世界由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组成，所有的人无论生存环境如何有限，都在不停地劳动和创造。世界如果不能对此有所认识，不能寻找不同文化的独特优势，就会因此受损。”（Achebe, 2000, p. 69）尽管历经政治和经济上的重重阻碍，《奥基凯》自1971年4月出版第一期起，一直延续着阿契贝对非洲现实的关注与批判。1981年底，他有更多精力投入该刊，并新出版了独立的《奥基凯教育副刊》（*Okike Educational Supplement*）。此时文学批评界开始提出“非洲文学的标准”问题。鉴于《奥基凯》拒斥“老套的、佞屈聱牙和毫无乐感的语言”“含混不清和令人费解的遣词造句”“充斥着外国舶来的意象”的作品，提倡“非洲的口头诗歌传统”“鲜活生动的文学材料”和新的诗歌创作手法，评论界认为，“在种类、新颖性和见解深度等方面”，阿契贝的《奥基凯》构成了非洲文学界最显著的现象，成为“非洲作家的标尺”（Lindfors, 2009, p. 122）。

阿契贝选择以英语作为主要创作语言，并非源于英语的世界通用属性，而是基于尼日利亚的社会现实——英语在该国承担着大部分日常事务的沟通功能。鉴于非洲部落语言零散不一，英语不仅

是一种外来语言，更成为维系国内二百多民族团结的沟通工具。阿契贝曾明确指出。“如果废除旧日殖民帝国的语言，那么当今非洲就不会有多少国家还拥有互相交流的工具……它们是非洲新的民族国家诞生过程的副产品。”（Achebe, 1988, p. 101）他以英语创作的作品积聚了众多非洲元素，既能让本土人民感到认同，又能被世界读者接纳。非洲民族独立后，前宗主国继续施行文化霸权，手段之一便是语言。宗主国语言成为官方语言，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书面母语，助推了权力等级结构的固化，使“真理”“秩序”“现实”等概念在殖民地得以确立。但阿契贝充分意识到，殖民者语言在对被殖民者文化实施宰制的同时，也使自身失去了稳定性。因此，他将英语用作消解颠覆殖民话语的策略，对“帝国”语言进行挪用和改写。“在这一统治过程中，主子的语言变得杂糅了。”

（Achebe, 1988, p. 103）以英语写作，必然与非洲本土文化语境元素杂糅，使非洲英语产生有别于帝国英语的变体。他改写后的英语语篇呈现异质语言陌生的文化形象和句法结构，反映非洲口传文化特征，相较宗主国英语显得较为松散，并包含非洲语言文化特色词汇，因而能更有效传达非洲经验。它与帝国英语仍保持充分相关性，仍能实现互相理解 and 交流，而这种改写是适应新非洲语境的必然过程。西方对非洲漫长的殖民统治已使非洲文化变得“不纯粹”，回到殖民前的语言状态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阿契贝的语言观有别于恩古吉等主张只用本土语言书写非洲文学的立场。口头文化强调动作和叙事，注重谚语的使用，阿契贝的作品正体现了这些特征。他有时使用非洲语言词汇而不加注释（如 *chi*、*obi*、*osu*），读者需通过上下文判断其含义。这种对符号的“误读”和“误用”在发音层面导致宗主国话语的不稳定性，解构了殖民话语的稳固疆界。阿契贝正是通过这些语言表象传达其政治和文化立场，形成了既不同于“东方主义”、也不同于恩古吉式“本质主义”的批评视角。关于英语的使用，阿契贝直言：“如果要问他（非洲人）能否像母语使用者一样使用英语？我会说我不希望如此……一种世界性语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要向许多不同的用法妥协。非洲作家在使用英语时，应该既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又不能过分修改英语以至于丧失其作为国际交流中介的价值。他应该努力塑造这样一种英语，既是普遍适用的，同时又能传达他独特的经验。”（Achebe, 1965, p. 83）

1965 年，阿契贝在乌干达《变迁》（*Transition*, 1965）杂志发表《英语与非洲作家》一文，指出非洲英语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将非洲文学划分为“民族文学”（以通用语言写成）和“种族文学”（以本土语言写成）两大类，认为唯有以英语等通用语言写成的作品才是民族文学，而数量众多的本土语言作品只能是种族文学（Achebe, 1965, p. 79）。他深刻认识到：“英语能够承载我的非洲经验的分量。但这必定是新的英语，虽然仍旧与其发源地息息相关，但是经过改动以适应新的非洲环境。”（Achebe, 1965, p. 81）他本人正是秉承这一理念从事一生的创作。尽管他后来意识到尼日利亚英语文学“仅是一棵成长中的大树上所有枝干中的一支”（Achebe, 2000, p. 87），不再坚持认为其他种族语言的文学创作就不那么具有民族性，并开始以伊博语创作诗歌，但他始终相信非洲英语文学是“出自非洲的新的声音，以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言说非洲的经验”（Achebe, 2000, p. 88）。英语与本土语言相互关联、交融、解域，促成了非洲英语文学别开生面的情景。这正契合了一种观点：非洲文学的界定不仅是语言问题，选择何种语言与非洲文学属性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理论上对写作语言选择的弱化，强调了写作视角对界定非洲文学的重要性——非洲作家必须立足本土文化和文学，才能塑造后殖民文学与文化身份。阿契贝在《非洲的一种形象——谈康拉德

《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中写道：“问题是这样一部宣扬非人化叙述，对人类的一部分进行去个性化描写的小说，能够被称作伟大的艺术作品吗？我的回答是：不，绝不可能。这样的人，我不会称之为艺术家，因为他挑唆一个民族去攻击另一民族，去摧毁他们。无论他的艺术形象是多么鲜明，他的韵律是多么优美，这样的人至多是一个胡乱祷告的牧师或者毒害病人的江湖术士。”

（Achebe, 1988, p. 18）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运用“野蛮人”“一团黑色的手臂”“黑色的身影”“疾病和饥饿的黑色阴影”“这些动物”等语汇对非洲进行“非人化”描写，正是殖民主义色彩的体现。阿契贝对此严正批判，揭示了西方对非洲“神秘他者”的集体无意识，并指出非洲读者的阅读视角与西方读者存在明显差异，旨在解构西方作家的“东方叙事”。1974年，他对非洲文学的界定发出明确声音：“非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场域——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从独特的位置观察到的整个宇宙……至于谁是非洲小说家，这是一个护照（身份）和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更是以那个视角观察的问题。”（Achebe, 1975, p. 29）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Yao Fe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3430-3556>

Wang Mingyue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5389-2988>

References

- Achebe, Chinua (1975). “Africa and Her Writers.”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Essays*, Heinemann: 23–31.
- Achebe, Chinua (1988). “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Heinemann: 1–20.
- Achebe, Chinua (1975). “Colonialist Criticism.”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Essays*, Heinemann: 3–21.
- Achebe, Chinua (1965). “English and the African Writer.” *Transition*(18): 27–30. Rpt. in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Heinemann: 75–84.
- Achebe, Chinua (2000). *Home and Exile*. Oxford UP.
- Achebe, Chinua (1988).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Heinemann.
- Achebe, Chinua (1975).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Essays*. Heinemann.
- Achebe, Chinua (2000). “Named for Victoria, Queen of England.” *Home and Exile*, Oxford UP: 39–70.
- Achebe, Chinua (1975). “The Novelist as Teacher.”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Essays*, Heinemann: 41–45.
- Achebe, Chinua (2012). *There Was a Country: A Personal History of Biafra*. Penguin Press.
-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1989).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Routledge.

- Banham, Martin (1965). "West African Writing."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01):11–18.
-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 Carroll, David (Ed.) (1980). *Chinua Achebe*. 2nd ed., Twayne Publishers.
- Gikandi, Simon (1991). *Reading Chinua Acheb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Fiction*. James Currey.
- Innes, C. L. (1990). *Chinua Achebe*. Cambridge UP.
- anMohamed, Abdul R. (1983). *Manichean Aesthetics: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in Colonial Afric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Jeyifo, Biodun (1991). "For Chinua Achebe: The Resilience and the Predicament of Obierika." *Chinua Achebe: A Celebration*, Kirsten Holst Petersen and Anna Rutherford (Ed.), Dangaroo Press: 254–264.
- Killam, G. D. (1969) *The Novels of Chinua Achebe*. Heinemann.
- Larson, Charles R. (1976) *The Novel in the Third World*. Inscape Publishers.
- Laurence, Margaret(Ed.) (1968). *Long Drums and Cannons: Nigerian Dramatists and Novelists, 1952–1966*. Macmillan.
- Lindfors, Bernth (2009). "African Vernacular Styles in Nigerian Fiction." *Early Achebe*, Africa World Press: 75–89.
- Mackay, Mercedes (1958). "Review of Things Fall Apart, by Chinua Achebe." *African Affairs* (228): 61–62.
- Mitchell, W. J. T. (1992). "Postcolonial Culture, Postimperial Criticism." *Transition* (56): 11–19.
- Moore, Gerald (1962). *Seven African Wri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bumelu, Ben (1967).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 *Ibadan Studies in English* (01): 215–225.
- Povey, John (1970). "The Criticism of African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02): 112–118.
- Ravenscroft, Arthur. (1969) *Chinua Achebe*. Longmans, Green & Co.
- Said, Edward W. (1978). *Orientalism*. Pantheon Books.
- Shelton, Austin J. (1970) "The 'Palm-Oil' of Language: Proverbs in Achebe's Novels." *The Conch* (01): 82–94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8) .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U of Illinois P: 271–313.
- Wali, Obianjunwa (1963). "The Dead End of African Literature?" *Transition* (10): 17–18.
- Wren, Robert M (1980). *Achebe's Worl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ovels of Chinua Achebe*. Three Continents Press.
- 陈榕 (2008) "欧洲中心主义社会文化进步观的反话语——评阿切比《崩溃》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外国文学评论》(04): 78–86.
- [Chen Rong(2008). "The Counter-Discourse of Eurocentric Social-Cultural Progressivism: On Cultural Relativism in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04): 78–86.]
- 段静 (2017): "钦努阿·阿契贝长篇小说中的口述性论析", 《外国文学研究》(03): 112–120.
- [Duan Jing(2017). "On the Orality in Chinua Achebe's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03): 112–120.]
- 杜志卿 (2010): "荒诞与反抗: 阿契贝小说《天下太平》的另一种解读", 《外国文学》(04): 63–70.
- [Du Zhiqing(2010). "Absurdity and Resistance: An Alternative Reading of Achebe's 'Peace in the Universe'." *Foreign Literature*(04): 63–70.]

黄永林、桑俊（2006）：“文化的冲突与传统民俗文化的挽歌——从民俗学视角解读奇诺瓦·阿切比的小说《崩溃》”，《外国文学研究》(05):127-133。

[Huang Yonglin and Sang Jun(2006). “Cultural Conflict and an Elegy for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A Folklore Interpretation of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05): 127-133.]

蒋晖（2015）：“现代非洲知识分子‘回心与抵抗’的心灵史——对钦努阿·阿契贝小说《神箭》的分析”，《外国文学》(06): 45-55。

[Jiang Hui(2015). “A Spiritual History of Modern African Intellectuals’ ‘Conversion and Resistance’: An Analysis of Chinua Achebe’s *Arrow of God*.” *Foreign Literature* (06): 45-55.]

瞿世镜（1997）：“尼日利亚的‘后殖民’小说”《外国文学评论》(04): 102-110。

[Qu Shijing(1997). “Nigerian ‘Post-Colonial’ Fictio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04): 102-110.]

任一鸣（2008）：《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Ren Yiming(2008). *Postcolonialism: Critical Theory and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颜志强（2007）：“帝国反写的典范——阿契贝笔下的白人”，《外语研究》(04): 112-118。

[Yan Zhiqiang(2007). “A Paragon of the Empire Writing Back: The White Man in Achebe’s Work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04): 112-118.]

姚峰（2011）：“阿契贝的后殖民思想与非洲文学身份的重构”，《外国文学研究》（05）：74-81。

[Yao Feng (2011). “Achebe’s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rican Literary Identit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5):74-81.]

姚峰（2013a）：“阿契贝的《瓦解》与小民族文学的游牧政治”，《当代外国文学》（02）：142-151。

[Yao Feng (2013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and the Nomadic Politics of Minor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02): 142-151.]

姚峰（2014b）：“阿契贝与非洲文学中的语言论争”，《国外文学》(02): 125-133。

[Yao Feng (2014b). “Achebe and the Language Debate in Africa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s*, no. 2, pp. 125-133.]

姚峰（2015c）：“阿契贝与小民族语言的解域实践”，《外国文学》(03): 98-106。

[Yao Feng (2015c). “Achebe and the Deterritorialization Practice of Minor Language.” *Foreign Literature* (03): 98-106.]

张湘东(1999): “阿契贝及其小说《瓦解》”，《外国文学》（06): 65-70。

[Zhang Xiangdong(1999). “Achebe and His Novel *Things Fall Apart*.” *Foreign Literature* (06): 65-70.]

赵稀方（2000）：《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Zhao Xifang(2000). *Postcolonial Theor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赵毅衡（2000）：“后殖民理论的争议”，《新文学史》(01): 10-15。

[Zhao Yiheng（2000）. “Controversies of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01): 10-15.]

朱峰（2013）：“家乡土地上的流浪者：《瓦解》中奥贡喀沃的悲剧”，《外国文学评论》（04）：56-62。

[Zhu Feng(2013). “A Wanderer on the Native Land: The Tragedy of Okonkwo in *Things Fall Apart*.”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04): 56-62.]

（责任编辑：邹涛）